



意大利女宇航员在太空喝咖啡

来自意大利的女性航天员克利斯托佛瑞提在太空中使用咖啡机冲泡了一杯咖啡，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太空咖啡师”。她引用电影中的台词说：“咖啡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有机悬浮液”。



星球粉丝齐聚米兰庆祝星球大战日

因为电影《星球大战》系列的一句经典台词：“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与“五月四日”发音相近，因此5月4日被粉丝们定为“星球大战日”。他们齐聚米兰，模仿电影各种角色，庆祝星球大战日。



巴西小女孩为摆脱贫困而选美

一年一度的巴西女孩选美大赛又开始了，众多8到12岁的女孩参加了比赛。这些女孩都是为了摆脱贫困，赢得奖金。



英国夫妻举行首例“钢丝上的婚礼”

英国萨默塞特，克里斯·布尔与非比·贝克夫妻将浪漫演绎到了新高度——穿礼服走过25米高75米长的绳索，在中间牵手，然后说出“我愿意”。这是英国首例“钢丝上的婚礼”。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门槛上，这个门槛如果迈过去了，就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当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渴望的不再是商场里更大的彩电和更多的衣服，而是医生的笑脸、孩子更少的作业、更方便的出行和更新鲜的空气时，经济结构就必须为这种需求变化而转型。

张斌：我们踏在转型的门槛上

□ 本报记者 卢昱



左庆/摄影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为听众讲解“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

4月25日上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张斌做客“齐鲁大讲堂”，为听众讲解“时代的挑战—中国经济的结构转型”，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节点上，政府、企业、百姓如何应对种种机遇和挑战展开生动论述，并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祖籍蓬莱的张斌，温文尔雅，来到山东，倍感亲切。

这位40岁的青年才俊，瘦高个，着休闲服、牛仔裤，声音极富磁性。平时蜗居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甘当家庭“煮夫”。其余时间，他把大部分精力放在观察、思考、写作中。

他对经济现象的捕捉和洞察，敏锐而深刻。“坦率说，我做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个题目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做这个课题也是个人的兴趣，社会的转型发展渗透到个人生活，从远处看，变化的轨迹很明显。”

中国经济正积蓄能量

“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匀速的。经济增长是阶段性的，从高到低，由低攀高，是在不断积蓄能量。”依此规律，张斌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拉长一点时间看，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门槛上，这个门槛如果迈过去了，就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

经济跨越“门槛”的标准，张斌借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提出人类发展三阶段理论来解读。“人类社会必然经历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在前工业社会，人跟大自然作斗争，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在解决温饱问题。到了工业社会，核心矛盾是人和机器之间的矛盾。人类有越来越多的好机器，生产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产品。”

丹尼尔·贝尔甫一提出三阶段理论时，他认为只有美国进入后工业社会。随后几十年里，西欧、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纷纷跨入后工业社会。张斌介绍说，其明显指标是：就业比重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业比重急剧下降，服务业比重急剧上升，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家用电器、交通工具等基本饱和，以信息服务业为支撑的后工业社会逐步到来。

“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时，人们会把更多的钱放在教育、医疗、娱乐上，而不是继续购买汽车、电视机。在工业社会的后期，城市的过度扩张，城市病越来越突出，同时人们对服务业、对高附加值的工业品，对一些民生基础设施建设，对公共服务，乃至好的空气，这一系列的需求是与日俱增的。”张斌谈到收入水平提高后，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铸就了社会转型的推力。

“后工业社会的核心矛盾，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矛盾，不是更多的机器，而是更好的服务。这个过程中，政府提供的服务也好，社会组织或个人提供的服务也好，双方如何取得信任关系，改善服务质量，这是人和人的问题，这是整个社会发展中最为迫切，也是最大的矛盾。”张斌重申“服务”在后工业社会中的重要性。

“不是每个国家都能从工业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的，它需要一定的收入水平，这背后隐藏的是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我用国际标准购买力评价，当收入水平在八千到一万国际元这个区间时，这个国家才可能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变化。”张斌解释道。

“回头来看中国，截止到现在，如果按购买力标准来算，我们也超过一万国际元。其实，早在2011年，我们就到了这个水平。如果和其他的国家规律一样的话，中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增长之后的积蓄能量阶段，或者叫调整阶段，在为向后工业化转型作准备。事实也是如此，我们从2008年以后工业部门占比在下降，服务业的占比在上升，这和国际经验一致。”张斌说道。

服务业需要金融体系改革

“如果转型顺利，老百姓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不仅仅吃饱肚子、消费工业品，在教育、养老、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的福利也日趋配套，这才是转型的目的。为了适应新阶段，过去我们想当然的东西，都面临挑战。”张斌如是强调“转型”的必要性。

在张斌看来，虽然我国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节点上，但整个社会在供给服务，如城市公共服务、一般服务业、高附加值的工业品、民生基础设施等方面，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过去我们是在陆地上跑，现在作了一个跳水的动作，要到水里去了，却发现水塘里没有多少水。”张斌形象地比喻道。

究其原因，张斌认为表面上问题出在政府，“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职能错位和缺位。第一是政府管了不该管的，第二是该管的没管好。就像现在医疗、教育，包括交通的服务，本不需要政府去管，但政府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多，最后限制了发展。”

“我们也不能把板子都打在政府身上，政府有政府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完全是政府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的问题。”话锋一转，张斌谈到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比如你去商店里买彩电，他告诉你什么牌子、什么型号，你大概知道这个产品会是什么样。但你去医院买药，不管你好还是不好，都很难说服务的质量究竟怎么样，他给你开的药值不值。还有教育、养老等，这种服务类产品不是制造业产品，它是无形的。消费者跟提供者提供的服务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就很自然而然，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张斌解释道。

在张斌的研究视野中，经济转型还需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金融体系，“如果不搞新的金融体系，是不可能完成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发展的。”

“在传统制造业发展过程中，银行的作用其实很简单，只要认识字，认识那些房产证、出口的各种单据就可以审查放贷。因为制造业有个特点，产品是有形的，厂房、设备都可以拿来抵押，而且国际市场相对稳定，利润也相对稳定。这时候银行和企业都能赚钱。”张斌分析道。

“到了服务业时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核心矛盾在人与人之间。我跟银行说：我来了，你给我贷500万。银行很难仅凭一个人的呼噜或信誉，来放出贷款。制造业可以复制别人的做法，即使做不到别人的程度，模仿个七八成也能赚到钱。但服务业不同，服务业的失败率很高，门槛很低。”张斌如是谈及服务业与银行的新型关系。

“我们在我们小区生活十几年了，我就观察我们小区门口的商业，小店基本上三年一换，有的一年都做不到。服务业就是这样，你拿不出像样的产品，就没法向银行要求贷款，

所以需要金融体系改革，来激励服务业发展。”张斌举例说。

“新常态”专治后遗症

随着大众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与日俱增，很多地方需要大量投资，这仅依靠银行是难以实现的。“投资机会很多，关键是做什么样的投资，不是能够引导资源向未来的服务业发展，引导民生方面的投资。”张斌说道。

政府在结构转型、经济下滑的压力下，往往出来刺激政策，通过增加对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钢铁、水泥等工业品的需求，缓解工业品的压力。这种刺激政策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

张斌认为，当高端基础设施越来越多时，会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修第一条高速公路很赚钱，但修到第三条时就没那么赚钱了，因为边际效应，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很低，只有3%；第二，既然是刺激政策，就要在短期内拿出很多项目，那必然带来糟糕的设计，铺张浪费。

“你看看北京地铁，地铁就是地铁，什么也没有。在法国巴黎，地铁犹如一个庞大的地下超市，地铁站里百货、报刊、饮食、音像、图书、服装鞋帽、礼品等商业网点超过800家。这在极大缓解地上压力的同时，还带动了商业发展。有的城市高铁站前广场跟足球场似的，本来修高铁是为了节省时间，但这么大的站前广场，出站得20分钟才能走出来。”张斌说道。

铺张浪费并不意味着基础设施过剩。“在北京的CBD，寸土寸金的地方，它后面有很多在县城都很难看到的油毡房，全都是临时搭起来的违章建筑。如果从容积率上来说，这就是‘城中别墅’啊。我们的基础设施远没有做好，那些很小的、地下的、跟民生联系很紧密的，很多是不完善的。”张斌感叹道。

不当的刺激政策有后遗症，主要是延迟了资源从产能过剩的传统工业向服务业的转移。张斌认为，政府看到后遗症越来越多，不会持续出台刺激政策，所以有了另外一条思路——新常态政策。

“‘常态’这个词不是一个经济学的名词，经济学我们讲稳态，稳态是讲水平或者增长速度保持在固定的水平。在我看来，新常态的政策其实是对过去强刺激政策进行反思后，提出来的新的工作思路。”张斌解释道。

在记者问及政府政策是否到位时，张斌回答道：“政府也是在不断学习调整中，在应对经济结构挑战时，很多金融市场的改革非常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做得很好。

金融市场改革真的是资本市场的力量，资本市场的力量对于公共改革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老讲政府职能改革，其实不应该把注意力全放在政府身上，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谁在推着它，哪些新的力量在推着它改革，市场的力量很重要。”张斌说道。

张斌以医疗改革举例说明，“过去到医院看病难。现在中国主要的风投公司最看中的项目就是医院，他们都在往里投钱。过去私人没法做，政府都卡死了。现在这些钱敢进去了，这些钱不是盲目的，它会带来一定的变化。不仅如此，与医院同时兴起的还有制药、医疗保险、职业教育和房地产等众多产业。收益不仅在于短期，这些投资会增加人力资本和减少交易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夯实基础。”

在张斌看来，仅仅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意愿还不够，人和资本要进得去才行。把服务业市场准入大门打开，资源能够流入服务业部门，这需要放开医疗、教育、环境、交通、电信和金融等部门的行业准入大门和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环境。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个严峻的考验，它需要打破诸多势力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但这也是能够支撑起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张斌恳切地说。

更公正地对待每个行业

如果想完成转型的腾笼换鸟、完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让服务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人们得到更好的生活水准，仅仅依靠新常态政策是不够的。

张斌指出，整个社会不光是政府，都需要转身求变，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认识到转型。

中国悠久历史，有民族自豪感，同时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有很长的屈辱历史，这个背景使中国人有强烈的赶超意识。所谓赶超，其实是工业产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比拼，可以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整个政府和精英阶层有强烈共识要发展工业。

“我觉得发展工业的思路大部分时间是对的，但到了社会面临经济转型时期，如果还讲‘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战略’等，就很难想象能有真正有利于服务业的政策出台。这些理念需要重新审视，因为我们现在的突出矛盾不是在人之间、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和政府之间、人和企业之间，应该更公正地对待每一个行业。”张斌强调道。

展望未来，张斌认为，如果将行业平等的理念转化成行动，人们就会发现我们平时讲的民权、民生、社会公正、和谐社会、包容性发展，更多是在强调处理人与政府之间、个人和个人之间、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改变理念，我们的政策还会集中财政资源，集中各方面的资源作各种各样的大项目。过去我们花很多精力做这些事很有必要，但要完全完成理念的转换可能需要一代人。”张斌说道。

在服务业中，公共服务和一些高端服务业占比很重，这需要合理的政策，也面临三个大挑战。张斌解释道：“第一，政府为什么要给你提供服务？这需要激励机制的作用。第二，政府怎么知道你需什么样的服务？得实现信息对称。第三，即便政府想为你服务，也知道你需要服务，他怎么给你提供好的服务？这需要技术的力量。这不光是中国的问题，我想全世界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要解决以上三个问题，从国内外情况看，需要三种力量。“第一，需要强政府，一个干事的政府。如果政府不干事，这些公共服务需要不可能得到满足。”张斌说道。

在张斌看来，光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政府天天想着捞好处也不行，所以要有个民主的监督或者民主的质询机制。“这个提出质询的机制，提醒政府我交了钱，我是纳税人，你要给我提供服务。还能通过这种自下而上的通道，告诉政府我还需要什么。”张斌阐述道。

第三种力量即法治。对此，张斌也有自己的理解：所有的法治都是你讲你的，我干我的，人与人之间有了清晰的边界之后，才可能融洽相处。比如家庭生活中，当婆媳关系不融洽时，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每个人记住自己的权利义务，不要越界。我们在协调人与人、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时候，也是同样道理，要明确界限、边界，让大家能够合在一块。

“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处在爬坡过坎的关口，但互联网创业正如火如荼地席卷大江南北。

对此，张斌有自己的见解，“互联网在某些领域起到了加速剂的作用，它改变了产业形态，会加速新陈代谢。很多企业会死掉，也会带来新企业的产生。最高端的制造业，都在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和服务业是互补的。对创业者来说，压力会更大，会逼迫产业、产品升级，在机器设备、产品研发上下功夫。好企业都是被逼出来的。”

对于最近股票价格上涨，张斌分析道：“一个东西价格高低大概看三个因素：第一，这个东西好不好；第二个你喜欢不喜欢；第三个你钱多不多。所谓好不好对于股票来讲就是预期怎么样，喜欢不喜欢就是风险偏好，价格高低就是市场流动性，看资产价格就看这三个要素的变化。这三个因素大概看一下你可以找到股市上涨的理由。”

“投资这件事，是对人性的考验，你能不能管理好你的恐惧心理，能不能管理好你的贪婪，能不能长期做到理性，这其实很难做到。我在股市到了特别特别便宜的时候会买一些，但风险稍微大一些，我就赶紧撤出来。尤其年长的人更要注意。”张斌坦言，自己不愿投身股市。

对于近期冷热相间的房地产行业，张斌预测道：“最近房价，包括房地产开发融资成本降低，央行几次降息，公积金政策的变化，房价会相对改善，所以没有那么悲观。我还是认同宏观经济今年往上走的。”

当生活中的普通一员渴望的不再是商场里更大的彩电和更多的衣服，而是医生的笑脸、孩子更少的作业、更方便的出行和更新鲜的空气时，经济结构就必须为这种需求变化而转型。对于个人如何享受到转型期的福利，张斌支招——“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不要指望政府会非常主动的，把它应该做的，你想要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你，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利用现有的法律，利用现有的沟通环节，需要把从下到上的声音和抱怨发出来。特别是公共利益牵扯到自己的时候，更需要发出自己声音。”张斌说道。

张斌以自己的经历举例，“我住的楼下有很多小餐馆，这些小餐馆到了晚上十一二点的时候还在开着音箱放歌，最不能忍受的是到了凌晨4点多还在放。声音非常大，楼下隔好几条街都能听见。我去找过几次，他们不听话。我打过几次110，也是当时起效，后来还是照放。”

“我们整个小区很多人都反映，都无济于事。最后我想了一个办法，我给市长信箱写信，把问题反映清楚，没多久一位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这个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请你监督。后来这个喇叭再也不响了。”

“跟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和精力很少。去年我去参加世界银行的会议，碰到一个人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律师，也有自己的企业。他说自己这十几年就没做别的事，就是每年都给世界银行写信，要求他们信息公开透明。现在世界银行开会都会请他。其实在咱们这也是一样，政府在这儿放着，你如果不给它压力，你不能指望他上门来给我们服务。”张斌说道。

张斌认为，“发出自己的声音”需要漫长的过程，需要公民意识和公民素质的提高，跟政府一块合力推动公共服务改善。“我们还是有耐心的，这是整个社会公民素质提高的过程，是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的互动过程。”

“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转型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资源重新配置没有一个好的转移，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对于未来，张斌不无担忧地说。